

金秋
出版

四川切望大典

DISCUSSION ON TIN-WARES

维微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锡器 / 维微编著.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410-4219-5

I. ①说… II. ①维… III. ①锡-金属器物-收藏-
中国②锡-金属器物-鉴赏-中国 IV. ①G894
②K87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5670号

说锡器 维微 编著

SHUO XI QI WEIWEI

责任编辑 梅锦辉 谭昉
封面设计 三川堂印务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刘凤莉
责任印制 胡显勇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 编 610031
制 版 成都市四时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成都市四时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240mm×240mm
印 张 18
字 数 80千字
图 幅 373幅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4219-5
定 价 268.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28) 87734418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7524918

說
金
器

DISCUSSION ON
TIN-WARES



维微 编著

目录

Content

序	004
自序	007
说锡器	010
图版凡例	027
图版及释文	028
茶具	028
酒具	058
水具	082
食具	090
盛具	110
灯烛具	132
熏具	144
文具	150
礼器	166
其他	192
款识集萃	208
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14

002 / 003

序

Preface

“何须愁日暮，自有一灯燃”。

一盏油灯的光亮，只够撕开方圆三、五丈的黑暗，微弱地照亮周遭有限的物理场域，而如豆的孤灯，倘若一朝能与大千过客中的有心人相遇相接，为一种文化观照的目光久久凝视，其烛照功能自会源源倍增，执拗地照亮一方更为广阔深沉的生活世界与历史文化空间。

维微正是这样一位有心人。其有声有色的锡器收藏，本缘自一盏普通的照明用具——锡制的书灯。自书灯而迄今，维微收藏的锡器已有三百余件。其中水壶、茶壶、酒壶等饮具为数尤巨。数年前，他请王世襄先生为他题写了“皕壶堂”堂名，又央其师张士莹先生镌了一方斋号印，其实他的壶尚不足此数，“两百”不过是虚指。据他解释，“皕壶”与“壁虎”谐音，盖取后者生命力顽强之意。此外，“皕”字结构对称平匀，颇考篆刻家的技艺，亦足见其性情之刁顽。后来他在寓所楼顶上起了一间画室，名其室曰“七丈山房”，一面取楼高七丈，心远地偏的意思，同时也是故伎重施。原想，那“七”、“丈”、“山”数字都在三画以内，笔画极简，书写颇具难度。然而，这次他同样未能得逞，因为题写者是人称鲶公的刘云泉。此公以“二爨”名闻天下，岂能为区区小伎所难倒？不过，当得知所题内容之时，阅历颇广的鲶公，也被其刁毒逗得一笑粲然。

购得皕壶堂第一件传统锡制器具，算算其来历已颇有些年份。维微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阴雨天，二仙庵南侧长廊花去的60元人民币，是他锡器收藏支出的第一笔资金。东西带回家，查资料知其形制名曰“书灯”，询长辈晓其俗称“手照子”。“书灯”顾名思义，为夜晚读书之用具，因燃油照明，自然是油灯的一种。而“手照子”之名，想是因为有柄，方便手中携持，可用于室内行走使用。

此器扁圆腹，流口嵌铜，以耐高温。手柄上方，插一只挑灯用的铜镊子，名曰“挑灯杖”，令人发怀古之幽思，无端联想昔人“醉里挑灯看剑”的境界。盖纽为红色料珠，于一色沉暗中，有提神醒目之功效。整个器型高挑挺拔，线条流畅简约，气象静穆素雅，颇有秋水为骨之寒士风神。

此一邂逅，堪称劈面惊艳、一见钟情，也骤然唤起维微的占有欲望，并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可谓越玩越爱，越爱越收。多到不得已，遂拍成图片，集结成书。尔后，书卖到台湾，卖到日本，卖到马来半岛。那书中油灯的光亮，竟自透出书斋，溢出西南，漫出内陆，直至穿过一湾海峡，向那更辽远的地方映射而去。然而，与昔时曾以影像之姿灿然出演于书籍舞台的荣耀者不同，他那一堆面容灰黑的锡器真身，看上去却远没有那么幸运。除少数几件陈列在博古架上，偶尔博取看客的一两声喝彩之外，其余的，都还委屈地挤在书柜的顶端，仿佛妆彩褪去的演出者，归隐缄默于帷幕落下后，后台一派晦暗不明的光影。

现代人历经个体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中的失落，对留下个体生命痕迹之物的保存，自然成为某些个体拒绝遗忘、规避异化的价值取向与情感载体。平凡锡器所承载的文化，不啻是一支来自大地岁月深处隐约可闻的号角，唤醒了维微的平民情结与文化情怀。此后他辗转于大江南北，孜孜寻访、且行且思，对中国锡器产生、发展、消亡及工艺与风格的变迁，从历时与共时维度，作了一番认真的体察与考量，从而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认知与一种难能可贵的总体性把握。这无疑为他在《中国锡

器图录》一书前言中的如是表述壮了胆：

这是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关于传统锡器的专书。

人们对老锡器，多半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人们大多见过或听说过锡壶、锡灯盏之类的老家伙；陌生，则是因为老锡器太普通，没人为之立传树碑，故相识而不相知，对其详情是不甚了然的……

目前，马来西亚锡器已经行銷世界各地。我国锡工艺制品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虽然已恢复了相当的规模，但相较于自身锡器文化悠久的历史，这种状况仍旧极不相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锡制品工艺的振兴，将取决于自身锡器文化的整理、发掘与研究。难怪维微谈老锡器收藏时有这么一段文字：

古玩收藏正在逐渐接近古玩的实质。古玩固然有材质、工艺本身的价值，但更有折射历史的价值。今天的古玩收藏正在由过去仅重视用料、工艺的倾向，悄然向材质、工艺与历史文化并重的方向转移。

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古玩的材质、工艺所呈现的艺术享受与艺术品的一般性投资，还要藉此吹散迷雾，匡正原有的历史误读，探求

本民族文化的真实过往。在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今天，一些民间遗物必将越来越受重视。伴随人们一路走来的老锡器，自然也不能例外……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知不觉间，步入人生中途的维微，临池已历二十余年。其在艺坛虽声名不显，但耐得寂寞的结果，却也有幸避免了流行书风的习气传染，书艺不俗，正可谓“一团清气自堪看”（此书封面“锡器”二字即为其手笔）。近年，更从张士莹先生习画，遍摹恽南田、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陈子庄、来楚生、李琼久等大师小师，上下求索，心摹手追之际，亦颇能有所会心，故绘事日工，有渐入佳境之势，其潜力尤为识者所重。这恐怕与其整日摩弄文玩，揣摩法帖名迹，潜心于文化研习，转益多师，注重厚积、体悟、打通等不无关系。

维微早岁从戎，因酷嗜书法而勤涉文史，虽身在行伍，然游心文艺。返籍后，阅读日益驳杂，交游更形广阔，时与学者、文士、画家、工匠相往还，且留意民间掌故、考释地方风物，搜集研求民俗器物，期于爱好之余，复有所成。奈何厕身体制之内却“不务正业”，

早萌退志又身不由己，使其所好不能尽展。对于披沙拣金所收藏的锡器，他的理想，是建立我国第一个“锡器文化博物馆”。但宏大的理想总得在凡尘中找寻一个落脚之处，这或许能让人明了理想者的真实处境和另辟蹊径的艰辛，靠一己之力，终究不能实现他欲成就的那番“伟业”。然而维微终是幸运的，寻寻觅觅中，前有人文书社刘旭东先生之独具慧眼，后有胡显勇先生之鼎力相助，慨施援手……

当年有了出书的合约，手握出书的定金，维微旋即动身前往北京、上海等古玩集聚之地，果断出手，将古玩市面上各式锡器搜罗一空。那时节，人们都将目光集中在瓷器、青铜器上面，暗黑的锡器毫不起眼，比起现在，价格实在低廉。其实此前维微手里的锡器数尚不足百，加上四处搜集的图片，根本不够一本书的内容。好在他对全国各古玩市场已作过调查，胸有成竹，知道东西该到哪里去寻。一番舟车劳顿，几度按图索骥，总算大功告成，于是方有那部国内第一本关于传统锡器的专著成书面世。

老锡器作为农耕社会的亲密伴生物，作为过往生活的重要物证，这一庞大而驳杂的器物

家族，好像从未引起过学者们的注意。这既与沿袭已久的重庙堂、轻江湖或民间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传统密切相关，自然亦与围绕这一传统形成的覆盖广阔、影响深远的话语系统，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惟其如此，似乎才足以解释老锡器在器物谱系学中长久的缺位，其丰富的语义拓展与广阔的文化前景，也只能在这种历史反思的前提下才会显影为一种可能。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说锡器》的意义自然浮现：它既是传统工艺发掘整理的绝佳蓝本，亦同时成为民间个人系统研究民俗器物之嚆矢；它既是一本首开先河、填补空白之书的丰满再现，亦是一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作。其文光图影间，劳作者的艰辛与光荣赫然并存。

一部器物史表明，时间并不能擦亮锡器，使其避免岁月的遗忘，唯有神奇的文化之光，才能透过历史的尘埃，照亮老锡器家族那些亲切熟悉的面影。本书原版的成功面世，便是有力的明证。而它的本次改版刊行，则既是一种完善自身、价值升级的努力，也是一种社会接受的再度确认。

值此书印行之际，我们欣慰地看到，当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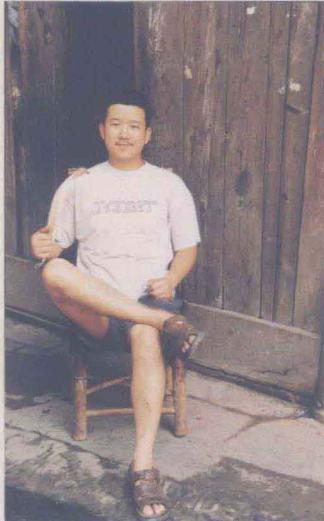
那盏文化之光笼罩的油灯，如今其光焰已更加炽烈，它在鲜明凸显锡器家族历久弥新魅力的同时，也照亮了中国锡器文化及民俗器物研究发掘更为广阔的前景……

冯至诚

2009年9月

自序

Author's Preface



作者在老锡铺门前留影

锡是古老金属，锡之为器，自上古而延绵至今。青铜器历来为世人所重，因其系出名门、血统高贵。殊不知历来所谓“青铜”，即为铜锡合金。倘以客观的眼光考量，青铜器与锡器，是互有关联却又绝然不同的两类器物。

青铜器乃国之重器，历来是社会政治、礼教上层森严的等级符号；而锡器，则是百姓居家过日子的必备家什，是日常生活史的重要物证。青铜器斑驳的锈渍，浸透着政治权利你争我夺的酷烈气味；锡器静默无语的存在，则见证了民间生活的喜乐与辛酸。遍观中国的器物史，几乎没有一种器物，能够像锡器这样——在上千年时间里被广为使用，尔后，又在短短的数年中，被迅速地废弃以至遗忘。

翻检史籍的书页，跃入眼帘的，往往是王朝兴盛衰落的宏阔起伏，而欲明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珍贵细节与朴素智慧，则不得不求助于稗官野史的零星笔录。对于这种由来已久的情形，章太炎先生在一次面对青年学子的时候，曾忍不住发问道：“你们考了满天的星斗，谁能告诉我，宋代人是怎么吃饭的？”只不过，当时这种棒喝似的问话，并未能让迷途者彻底警醒。

人们的历史视角，通常重视社会结构中的权力上层，而忽略下层民间。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不例外。博尔赫斯就曾提醒：“历史是礼拜仪式上的长篇大论，其中每个小标点的重要性，不低于整段整段的文章……”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全球一体化”浪潮中，人们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文明趋同、个体性越来越失落的情形。故尔对留下个体生命印迹之物品的收藏所作的保存个体性的努力，已经成了某些个体维系主体及文化多样性的生存策略与情感挣扎。而老锡器折射出华夏生活史的鲜活侧面，正是个体生命痕迹与文化个性极为突出的历史遗物。

从青铜文明进入历史，仅仅能看见帝王将相所谱写的鸿篇叙事；而从锡器文化进入古人的日常生活，才能够倾听平民百姓的街谈巷议、燕语呢喃。青铜器巍然在上，不愧“居庙堂之高”；锡器卑然在下，自然“处江湖之远”。如果说青铜器所代表的是庙堂文化，那么锡器所代表的，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江湖”文化，或称民间文化。

本书原版发行之前，从未有过专书论及锡器，而锡器收藏却不全然属于冷门。就笔者所知，

明、清两代文人锡器收藏历史悠久。在那些精美的锡器制成之初，就有不少收藏者。只是在距今最近的一次收藏热潮到来之际，老锡器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自本书原版于2003年发行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收藏家们这时开始意识到文化含量丰富的老锡器，是极具赏玩与研究价值，且收藏前景十分广阔的珍贵文物。本书原版发行之后半年左右，笔者再次光顾北京潘家园、上海豫园等古玩集聚之地，即遭遇明显的“物价腾贵”，老锡器的价格一般都较前半年上涨了四至五倍。尽管如此，这之后，人们对锡器的系统收藏、整理与深入研究，似乎并没有新的成果出炉。本书原版发行至今七年有余，笔者仍旧没有见到当初“抛砖”想要引出的那个“玉”。同时，在网上检索与老锡器收藏有关的数十个条目，所见到的内容，也多是本书原版内容的转载，或者干脆是改头换面之后，自署其名的厚颜抄袭。

说到抄袭，让笔者感到意外的不是抄袭行为本身，而是抄袭者的身份。2006年，北京某报刊载一篇名为《锡器收藏正当时》的文章，文中大量引用本书原版有关文字，然而自始至终未标明其观点、内容的出处。因笔者



王世襄先生所题“陋室铭”

并非专业学术界人士，对此只一笑置之，本不以为意。但其人此后继续通过各种媒体重复演出，俨然一副言自己出，越樽俎而代庖厨的架势。而这位文抄公的身份，居然是某国家级博物馆的“青铜器专家”，这让笔者开始意识到传统锡器研究，还蕴藏有别的奇货可居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对那位身居学术高位的剽窃者的肆无忌惮感到骇然。此前，笔者对正统学术圈“如滔滔江水般”的景仰之情，也险些在那一刹那荡然无存——好在那种欺世盗名的

巧取，无损于锡器文化的自身价值，说不定反倒对人们重新评估锡器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是让笔者感到意外的唯一例子。

本书原版甫一面世，即迅速越出内陆，流向境外。中国台湾、日本及马来半岛的一些网上书店，很快就有售卖纪录。而本书原版从标题到内文纯用中文，此书快速在境外行销，也完全出乎笔者意料。

而意外并没有就此终止。原版面世后不

久，笔者陆续接到一些从各地打来的电话。大致内容，无非是锡器收藏方面的咨询与交流。而其中一个电话，来自新疆人民出版社担任本书原版责任编辑的贺灵先生。其内容系由人文书社刘旭东先生转达，说是对笔者顺致谢意，因为此书为贺灵编辑晋升高级编审，增添了重要砝码。本书原版成书仓促，而就是这样一本质量尚未令人满意的小书，似乎已经在无意间，填补了民俗器物研究及出版方面某项学术空白。

“青铜器受重视历代皆然，而锡器受冷落，则应当成为过去”，是本书原版所发出的轻声呼吁。目前，老锡器收藏的格局以及上述种种意外，无形中使本书再版的必要性陡然增加。为了使老锡器继续受到收藏者的持续关注，让其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受到民俗器物研究者或研究机构的应有重视，笔者有意将本书重排改版。在得知笔者的想法之后，华炜集团董事长胡显勇先生，当即表示愿倾力资助，使这一夙愿很快得以实现。

本次改版所录历代锡器，90%以上是笔者十数年间八方搜求所得。对原版中少量名称功用考订不详、器物重复或图片质量不高的部分一概予以删除，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若干幅图版，且重新对文、图进行了修订、编排；将原

版的32开简装本，改成更为时尚美观的12开精装本；书名也由原先的《中国锡器图录》改为现在的《说锡器》；因为原版以图录为主，改版则图文互动，突出锡器所蕴含的器物史、生活史内容的详尽述说。但愿这样一部修订改版的小书，带给读者更多美好的感受。

此书能够以这样较为完整的形式再度面世，首先要感谢华炜集团胡显勇先生的慷慨襄助，同时也要再度感谢人文书社刘旭东先生于七年前独具只眼，认同这样的选题。中国锡业首席专家黄位森先生为本书提供了专业的意见，成都日报资深编辑冯至诚先生欣允为本版作序，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段文哲女士、韩语系周海舟先生、成都杨光露女士为本版英语标题提供了详实的考订，四川省美术出版社梅锦辉副编审、谭昉编辑以及四川教育学院周宁女士，四川大学雷文景、张哮先生，成都博物院刘振宇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意见，陈桂生、戴文先生为本书篆印，黄正中先生为本书摄制了部分图片，三川堂设计制作公司张成秋、沈嘉、张桑榆先生在本版设计方面贡献了卓越的智慧，本人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这里必须特别提及，曾为本人题写堂名并予我以极大鼓励的王世襄先生于去年11月物故，未见此书成编，留下永远的遗憾。笔者本

次将王世襄先生所题堂名收入，固然不无“壮大门面”的功利考量，但更欲借此表达对畅安先生的由衷感谢与深切缅怀。

锡器文化是个大题目，本书此次修订改版，难免仍存许多纰漏与不足，尚祈读者、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维微

2010年3月11日



说锡器

Discussion on Tin-Wares

人们对老锡器，多半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人们大多见过或听说过锡壶、锡灯盏之类的老家什；陌生，是因为老锡器太普通，没人为之立传树碑，故相识而不相知，对其详情是不甚了然的。

锡是古老金属，锡之为器，自上古延绵至今。作为一种金属器物，锡器见证了华夏生活史丰富的过往。如今，那些曾与我们父辈、祖辈们朝夕与共的老锡器，以及它们所展示的旧时生活摇曳多姿的琐碎细节，正在被我们记忆的存储器迅速删除……

了解老锡器，自然要从金属锡开始。锡是一种银白略泛珍珠色的金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之一。锡的熔点为232℃，沸点为2270℃。锡较软，具有良好的展性，而延性却很差，可以碾压成厚度仅为0.04毫米的锡箔，却不能拉成锡丝。锡于常温下是不受影响的，长期在潮湿空气中，锡的表面会生成一种极薄的氧化膜而阻止进一步氧化。

锡有两种同素异形体——灰锡和白锡。我们通常所说的锡，是白锡。灰锡的密度为5.85/克·立方厘米，属等轴晶系的半导体；白锡的密度为7.3/克·立方厘米，属正方晶系的金属，其结晶转变温度为18℃。白锡温度低于13℃，开始转变为灰锡，但转变速度极慢。当过冷至-30℃时，转变速度达到最大值，这一变化被称为“锡疫”。锡疫会使白锡发生膨胀、出现麻点，进而分裂散碎，直至成为粉末。有则故事涉及这一物理常识：据说一年冬天，俄国彼得堡的军队发下了冬装。可奇怪的是，所有的衣服上都没有纽扣。沙皇雷霆震怒，要拿监制冬装的大臣问罪，大臣不服，亲自到仓库查验，结果发现库存衣服上的锡制纽扣也都不翼而飞。这件事被一位科学家得知，他向沙皇解释说，这些衣服上原来都是有纽扣的，只是锡制的纽扣在低温下发生“病变”了。为了证实科学家的论断，宫廷侍从在皇宫花园的石凳上放了一把锡壶，几天后，锡壶变成了白色的粉末。这是因为彼得堡冬天的气温，常在-45℃左右，锡制的纽扣，自然要发生晶形转变了。



科学探测告诉我们，我国是锡矿较丰富的国家，矿藏分布主要在南方，大致可划为三带：两广沿海带——以开采砂锡矿为主。南岭带——分为个旧区、广西河池南丹区、湘桂区、湖南区、赣南区。据考证，丹池矿区锡的开发当始于南宋前朝，至今也有850多年的历史。浙江带——以浙江永嘉、开化、遂昌一带的锡矿为主。周秦间，江苏无锡市西产铅锡，汉初锡绝，因以“无锡”名县（见《嘉庆一统志·八六·常州府》）。据宋代陆游《入蜀记·卷一》所载，另一种说法是：“无锡县……近邑有锡山，出锡。汉末谶记云：有锡天下兵，无锡天下清；有锡天下争，无锡天下宁。至今锡见则掩之，莫敢取者。”而“无锡锡山山有锡，长沙沙水水无沙”则是后来为人熟知的趣联。除上述产地之外，后又在四川、内蒙和新疆等地发现了锡矿。

人类的祖先最初发现金属是从天然金属开始的，在制陶技术的影响下，逐渐具备了冶铸术的三大要素，即找矿、造型和熔炼的条件，这样就从起初的“偶然金属”，进入到有意识的人为配方的金属冶铸时代了。

我国具有悠久的炼锡历史，至迟在公元前

1200年左右，已熟练掌握炼锡技术。古代早期由于对锡和铅两种金属认识不足，往往铅锡不辨，混为一谈。从一些青铜器化验得出的结果表明，商代已达到分别炼出铜和锡，然后配制合金的高级阶段。锡在古代之所以受重视，也是因为它能使铜硬化而形成青铜，追溯锡器的历史，涉及青铜器的起源。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长江流域，有青铜、红铜，也可能有黄铜。到了夏代，史书有“禹铸九鼎”并“以铜为兵”的记载，其后夏王启组织人力，开采铜矿，在昆吾（今河南濮阳）冶铜铸件。商代，铸铜技术有了突破，已能用铜和锡、铅等原料冶炼成铜-锡-铅三元合金，性能因而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铜器造型技巧也日臻成熟，形成了中国古代用铜以青铜为主要材质的特点，这也使锡在相当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成为地位仅次于铜的重要金属，成为青铜文化重要的物质成分，与古代人民生活发生着密切的关系。

青铜铸造技术受制陶的影响，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在青铜合金成分上，已由铜锡二元合金发展到铜、锡、铅三元合金。青铜中的锡铅含量显著提高。从春秋

开始，尤其是春秋后期，我国的青铜铸造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仅能熟练配制锡青铜、锡铅青铜，还总结出六种不同用途的青铜器中铜和锡的配比，即《考工记》所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在古代，金、银、铜都可以称“金”。《考工记》“金有六齐”的“金”，指青铜；“六分其金”的“金”，指红铜。经科学测定，这里所说的“锡”，实际上还包含铅在内。这一时期所铸造的一些青铜器件，即或在科技十分发达的今天，在冶铸技术方面，仍旧绽放出令人目眩地光辉。

锡之为器

Tin Utensils

目前，考古发掘的证据表明，锡器的历史略晚于青铜器，但锡器却比青铜器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人类古代遗迹中，很少发现纯锡器。在埃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75~1308年）金字塔中发现的锡手镯和锡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锡制品。最晚至商代，我国就已经有了锡制器物。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中出土的锡块和外镀厚锡层的虎面铜盔，表明锡的特殊物理性能，此时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大司空村殷墟中出土的六件锡戈，以及云南楚雄万家坝发现的战国时期的50余件锡制饰品，则已经是纯粹意义上的锡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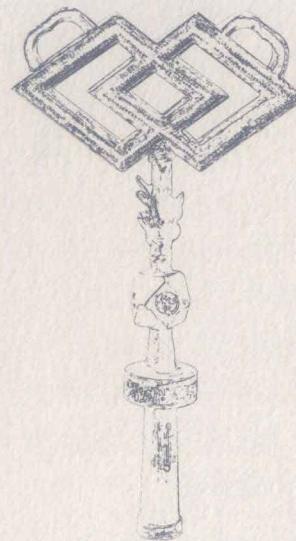
先秦时期，锡业是由专设机构经营管理的，《周礼·地官》：“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就是明证。

秦汉以后，虽然青铜已由铁器替代，但锡的用途却日趋广泛，其产量有增无减。汉代，有相当一部分锡被用来铸钱，那时所铸钱币史上著名的“白金三品”，采用的就是银锡合金。锡在当时，并不十分贵重，但也绝非平常随用之物。汉文帝节俭治国，其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班固《贊》曰：“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后代有人感叹文帝之薄葬：“……惟文帝平生节俭，人无间言。临终遗至薄之制，微至铜锡，不以为饰，炳然载诸史册……”

我国最早有关锡的文字见于《周礼》，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也有关于赤锡的记载，其后从《汉书·地理志》、西晋《华阳国志》、隋代《颜氏家训》、唐代《蛮书》到宋代《续博物志》，均有对锡的论述。

汉以后，锡器照样在一定范围内被人们所使用。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终制》：“至如蜡燭、牙玉冢、锡人之属，并须停省。”其所指的锡人，即殉葬用的锡制人形。

唐代用锡有明确的规定，《唐书·食货志》：“太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开成元年时，岁产锡仅“万七千斤”，因而朝廷对包括锡在内的部分金属，仍采取相应的控制手段，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唐书·食货志》：“山泽之利……盐铁转运使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



到了宋代，文献中关于锡器的记述增多，其具体内容则表明社会普遍使用锡器的时代已经到来。

宋代仍有将大量锡器作为殉葬品的。宋代范公偁《过庭录》载有这样一件趣事：“文正长子监薄纯佑，幼有智略，与富彦国家子弟游。富氏引葬，陈设从葬祭用甚盛，观者如堵，器用盖锡造者。监薄在侧，取一器掰而示众曰：‘此锡器，尔等谓何物耶？’富子大怒，以为笑已。监薄徐谓曰：‘尔何所见？吾正恐愚民致疑，害尔先茔耳。’富子叹服。时始十余岁。”

同时，民间锡器之普及，已大大超越了前代。此时的锡器，无疑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打锡器成了重要的民间手工艺，同时也成了市井之中不可或缺的热门行当。吴自牧《梦粱录·铺席》有“……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官巷北金药臼楼太丞药铺、胡家冯家粉心铺、染红王家胭脂铺、淮岭倾锡铺……”《梦粱录·诸色杂货》“……其（杭州）巷陌街市，常有使漆修旧人；荷大斧，斫柴；间早修扇子，打镴器……”“……卖镴器，如樽榼、果盆果盒、酒盏、注子、偏提

盘、孟勺、酒市急须、马孟、屈卮、渣斗、箸瓶。……及小儿戏耍家事儿，如小酒器……”何谓镴器？《辞海》“镴：……锡属”，《尔雅·释器》“锡谓之釭，注‘白镴’疏：‘锡，今白镴也，一名釭。’”《辞海·白镴条》：“Soider or Pewter化学名词，亦名焊药，为锡与铅之合金，其比例不一，质坚易熔，用以接合诸金属，或涂于锅壶之里以防锈蚀。”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锡制品的特殊物理性能，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有：“邕州溪洞及钦州村落，俗多鼻饮。鼻饮之法，瓢盛少水，置盐及山姜汁数滴于水中。瓢则有窍，施小管如瓶嘴，插诸鼻中，道水升脑，循脑而下入喉，富者以银为之，次以锡，次陶器，次瓢……以为凉脑快膈……”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上》有：“眼药有九龙膏，方用冬青叶一栲栳，洗净，投锡器内，用水满煮令黑色，及一半起，入宣黄连十两，洗净剁碎，入冬青水中煎，慢火熬至仅有一盏，胶粘如糖，然后取起，重绢滤过，令极冷，入脑子二钱半，罐子内封藏。每用少许点眼。”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则有：“以笺香或降真香作片，锡为小甑……”等记载。

由于锡器容易产生锡疫且可以回炉再造的缘故，历史上许多有价值的古锡器未能存留下来，这或许是古锡器考古发现极少的直接原因，但近年一些古代日用锡器的出土，证实自宋代以后，锡器仍在民间广为使用，制作亦日见精良。明代一些锡器甚至用于海外贸易，这一情形近年已由南海沉船所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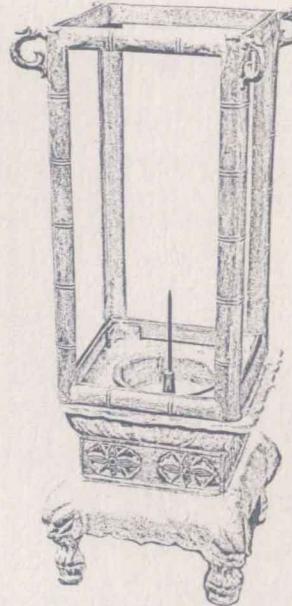
明代，有人受紫砂制作工艺的启发，制作出观赏性极强，适合把玩的仿紫砂锡器，终于将锡器制作推上了纯艺术的高度，锡器历史上以把玩为目的的文人锡器诞生了。

仿紫砂锡器甫一面市，就引起了文人雅士的浓厚兴趣，一批制作精良的锡器，作为独特艺术品被迅速推向市场，使锡器一举跻身珍品雅玩的行列，也使锡器制作进入到工艺审美的自觉阶段。明代，由于锡器尤其是文人玩耍的锡壶引起众多爱家的关注，一时间锡壶制作名家辈出，他们不惜工本，反复实验，制作出许多美轮美奂的文人锡壶。

明代万历年间，苏州人赵良璧制锡器，仿时大彬的紫砂式样，开一代新风，同时也成为仿紫砂文人锡壶制作第一人，可惜其作品已无流传。稍后，归复初继之，仿紫砂锡壶名声

始大盛于世。归复初，字懋德，也是苏州人。他以生锡制壶身，用檀木作壶把，以玉作壶嘴和盖钮，其作品在当时卖价就很贵。清代谢堃在《金玉琐碎》中说归复初制锡壶“取其夏日贮茶无宿味，年久生鮀鱼斑者佳。”可见“归壶”之“品地”确乎不凡。北京故宫博物院有锡壶一件，款字为“己丑冬日归复初制”【按：己丑即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谢堃所说锡壶用久生“鮀鱼斑”，就是在银灰色锡壶上生一种黄褐色不规则之斑块。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锡注以王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

王元吉应是黄元吉，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就曾说：“吴越之音，每王、黄不辨。”黄元吉，浙江嘉兴人，所造各式茶具都极精巧。他所制锡器色泽似银，壶盖和壶身十分严密，合上之后，提盖而壶身亦起，与时大彬的紫砂壶特点相同。至于器身倾侧，则绝无落帽之病。每制一壶，人们视为珍品。《茶余客话》、《阳羡陶说》、《浙江通志》等书均曾



提及此人。

到了明代宣德年间，苏州有个叫朱端的匠人，以锡制各种器皿，造型奇古，人称“朱家鼻”。明文震亨《长物志》云：“锡壶有赵良璧者，亦佳。然而冬月间用近时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价皆最高”。这里所说的“黄锡”，指的是万历年间黄裳所制的锡壶。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曾说：“里中黄裳者，善锻锡为茶注，模范百出而精雅绝伦一时，高流贵尚之。陈眉公作像赞，又乞余予数语漫应之”。黄裳也是嘉兴人，精于设计，制器“模范百出”。

入清以来，一方面文人锡壶承明代之余绪，仍旧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另一方面，民间日用锡制品造型也获得了充分的自由。

清代初期至中期，文人锡器仍旧备受士绅阶层的青睐，涌现出不少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锡器工艺大师和锡作高手，他们在锡壶制作工艺、材料、装饰等方面，都有一些崭新的突破，制作了一批独具创意的锡器精品。清代承明制锡壶工艺的第一位名家是沈存周。沈氏字鹭雍，号竹居主人。活跃于康熙时代，浙江嘉兴人。清代大诗人朱竹垞过生日，沈曾为之制一锡渣斗。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其所制圆锡壶

一件，盖面上凸，上有白玉球形钮，壶把为紫檀木嵌制。壶身一面刻行书“世间绝品人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款字“陆希声句，沈存周书”。另面亦刻行书“爱甚真成癖，尝多合乃仙”，款署“徐玄句，存周再笔”。壶身有印章四，壶底正中有篆书印章“竹居主人”。锡质温润，古朴雅致。沈存周之后尚有沈朗亭亦以善制锡壶名世，故宫藏有其桃式锡壶一件。

卢葵生，名栋，扬州人，是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漆工。卢能书善画，精雕刻，有创新意识，漆沙砚就是经他之手改制发扬的，而把锡壶与漆器结合则更是他的创造。他以锡作壶胎，外以漆制壶形，这就是有名的“锡胎漆壶”。现有四件存世品为人所知：一为仿紫砂梅花壶。圆形扁矮，色泽与形制完全仿紫砂，不细观难以发现是漆制。壶身刻梅花，花下刻行书：“竹叶浅斟，梅花细嚼，一夕清淡，几回小坐”。款字“葵生”，下有小方印“栋”。一为圆方四棱体，鳝鱼清色漆沙皮，锡胎。壶身一面刻篆书：“春芽细煎，东风一帘。今日何日，谷雨之前。”款字为“竹汀居士书”，下白文印“大昕”。壶身另一面刻山

